

哈佛燕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第四種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明清婦女著述彙刊

1

方秀潔(Grace Fong) (美)伊維德(Wilt L. Idema) 主編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責任編輯 雷回興
裝幀設計 楊琮斌
責任技編 黃珊虎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
方秀潔，(美)伊維德主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9.3

ISBN 978-7-5633-8239-2

I．美… II．①方…②伊… III．古典文學—作品集—中
國—明清時代 IV．I214.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002736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541100)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170 字數：360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2900.00 元 (全 5 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序言一

欣賞與研究的文學寶庫：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

方秀潔 (Grace S. Fong) 著 王志鋒譯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西方中國研究最激動人心的發展之一出現在女性文學、女性文化與女性歷史的研究領域。在本書序言二中，伊維德 (Wilt L. Idema) 教授對英文學界的調查清楚地表明，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以來，論述前現代中國女性作者及其著作的出版物數量激增。伊維德令人信服地說明該研究領域在西方已經確立為「中國研究中的重要領域」。眾多因素促成這一令人矚目的發展，尤其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女性著作珍藏，推動了目前這套重印系列《中國歷代婦女著述叢刊》的實現，也是現在與未來研究工作得以開展的核心因素。

女性主義的影響

西方學界新近的努力與活躍，無論直接或間接，應歸功於西方女性主義發展的影響。女性主義以理論化與批評性的研究議題，主張把性別作為分析的基本類型，引入歷史和文化研究中；對權利、身份和能動力 (agency) 的基本概念提出質疑；批判以往西方女性主義論述中自身存在的將「第三世界婦女」作為知識客體的單一結構。這些都對西方學者思考中國歷史語境中女性與性別

問題的方式產生影響。^① 在受女性主義方法學影響的研究中，歷史與文化特定性的意義得到確認，並帶動相關研究的進行與理論在研究中的實際運用。在文化與文學研究領域，經典價值觀與標準等級受到質疑，甚至被顛覆。那些承認並能證明某些文本價值（主要是男性創作的）的標準與習俗值得受到批評性關注，並曾一度造成研究上的多種限制的界限，現在已經被突破。高雅與通俗、精英階層與普通大眾、支配／主流與邊緣的傳統價值觀和人為劃分，受到挑戰並被相對化，得以公開進行批評商榷。

為了開拓以往被忽略的主題或採用新方法對舊的論題進行分析，傳統學科如文學、歷史、人類學和心理分析不斷相互汲取批評方法與理論見解，因而觀念架構、方法學與研究手段朝著跨學科整合的方向發展。隨著（更）新興的（綜合）學科如傳媒研究、電影研究與視覺文化的發展，主體性建構與觀眾／讀者定位理論也不斷擴展深化。無論從正面或反面，有意或無意，所有這些發展或多或少都涉及作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的男性、女性以及性別問題。

在中國帝制時期的女性與性別的歷史與文學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的多樣與研究成果的豐富證明了這些理論思潮與方法學的積極影響。伊維德教授在他全面的考察報告中概述了會議論文、期刊論文、專著章節、研究專刊、論文集、博士論文以及參考書目和研究現狀評論等其他形式的各種出版物。但是，任何歷史與文學研究的關鍵問題，除了研究議題的觀念化表述外，還在於能否掌握原始文本材料和文本來源。雖有機會接觸並閱讀中國歷代婦女著作，仍然是影響該領域研究得以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筆者將在後文提到這點）。如果沒有胡文楷這位學者志趣貫徹終身的努力，該研究領域不可能發展到今天內容覆蓋如此廣泛的地步。

① 有關問題的開拓性和有影響的著作包括：瓊·斯科特（Joan W. Scott）：《性別：歷史分析的實用分類》（*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1卷第5期（12月，1986年），第1053—1075頁；錢德拉·塔爾佩德（Chandra Talpade Mohanty）：《西方視野的關注：女性主義研究與殖民話語》（*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收入錢德拉·塔爾佩德、莫漢蒂·安·盧梭（Ann Russo）和羅爾德斯·托雷斯（Loudes Torres）編《第三世界女性與女性主義政治學》（*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印地安那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51—80頁；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別困擾：女性主義與身份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羅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1990年。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有關話語與權力的論述對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主義理論化過程有著意義非凡的影響。

胡文楷的貢獻

隨著胡文楷（1901—1988）編輯的《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版在一九八五年的出版，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突然開始意識到中國女性寫作的悠久傳統，特別是在最後兩代即明清時期女性寫作的繁榮。^①該著作記錄了從漢代至民國初年超過四千種的婦女著作題名，是目前有關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女性著作最為完備的文獻書目，並成為從事中國歷代女性作者研究必備一冊的「聖經」。正如明清女性研究權威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所說，胡文楷的歷代女性著作目錄使我們意識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出現的女性詩歌選集與別集能比晚期中華帝國更多」。^②

這部價值巨大的文獻書目的成書過程令人感慨。胡文楷，江蘇崑山人。年輕時有意於女性著作的搜求與整理，可能是受其夫人王秀琴的影響。王秀琴（1902—1934），浙江紹興人。在二十世紀早期，他們夫妻二人開始致力收集並復制女性著作。不幸的是，王秀琴年僅三十二歲便撒手人寰。在她離世後，胡文楷不僅將王秀琴生前所收集的歷代女性文章匯編成集，還特意將她的名字署為編者，出版了兩部總集：《歷代名媛書簡》和《歷代名媛文苑簡編》。^③或是出於對王秀琴的紀念，或是出於自身興趣，胡文楷通過求訪上海和江蘇周邊地區的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以及通過在北京和其他中心城市的私人關係，繼續系統地努力搜求與編選女性著作。^④即使原本已不存世，胡文楷也會從圖書館與藏書家目錄以及地方誌中記載的書目中梳理出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地區的女性出版物和寫作手稿的記錄。如此辛勤近四十年，這部內容龐大的書目於一九五七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當時胡文

①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該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五七年首次出版。在此感謝劉詠聰教授給予筆者分享：她即將出版的對胡文楷編纂女性著作書目及對史學的貢獻所做的深入研究。參見：劉詠聰：《目錄繫於史學：論胡文楷編纂女性著作目錄之貢獻》，收入李金強編：《橫看成嶺側成峰：二十世紀中國史學之回眸研討會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② 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明清女性詩歌總集》（*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收入魏愛蓮（Ellen Widner）和孫康宜編《明清時期的書寫女性》（*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第147頁。

③ 王文琴編集，胡文楷選訂：《歷代名媛書簡》，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王文琴似乎特別鐘情於女性散文文集。參見胡文楷《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中的相關目錄，第921頁。胡文楷提及這本總集收錄了從漢代至明代女性創作散文一百二十九篇，清代女性散文一〇七篇，但凡是在晚明時期由趙世杰編輯的《古今女史》（第888—889頁）與一八四六年周壽昌編輯的總集《宮閨文選》（第919—921頁）中收錄的女性散文都不副選。

④ 參見胡文楷一九五七年版序言，一九八五年再版收入該序，第5—6頁。

楷在商務已從事編輯工作多年。但那時的中國正經歷激進的變化，并在「文革」時期達到頂點。胡氏書目作為一部工具書的首次出版沒有遇上合適的時機。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持續的學術研究才恢復。正是這時期學術研究的復蘇促成了《歷代婦女著作考》一九八五年增訂版的出版。

根據劉詠聰對兩個版本所做的細心比較，胡文楷修正了一九五七年版中的錯誤與作者身份，並增加了他在初版後陸續新發現的女性著作一百三十種。所錄著作從一九五七年版的四千二百六十二種增加至一九八五年版的四千三百九十二種。^①一九八五年版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該書已經絕版。^②同時，自一九八五年後，從舊書店、地方圖書館、私人藏書以及現在的拍賣行里，許多先前未知的女性寫作別集陸續被發現。^③中國年輕一代的學者們，正如劉詠聰所說，受胡文楷的激勵，不斷用在山西、湖南、廣西這些地區新發現的女性著作作為胡氏書目的補充。^④由於認識到這部參考書目不可或缺的價值，南京大學的張宏生教授，一位極具權威的女性文學研究學者，已成功地說服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歷代婦女著作考》，並在書后附以《勘誤表》和《補遺》。^⑤該書能夠再版真是令人期待已久。就筆者所知，在歐洲各國或美國還沒有如此完備的有關西方女性著作的文獻書目。

什麼在文本中？

文化與社會歷史學家高彥頤(Dorothy Ko)和曼素恩(Susan Mann)在為寫作她們各自的開創性著作而進行的研究過程中，都

① 劉詠聰用表格的形式對每卷增加的條目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參見《目錄繫於史學》第11—15頁。

② 出版信息顯示該書印數達到七千二百冊。

③ 史梅在她的研究發現：胡文楷沒有見過江蘇地方志中記載的二百多位女性作者。參見：《江蘇方志著錄之清代婦女著作考——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拾遺》，原載《古籍研究》1996年2期，收入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6—260頁；又見：《清代江蘇婦女文獻的價值和意義》，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2—501頁。史梅曾告訴筆者，女性文人在清代高度集中在很多常熱這樣的城市中；當地圖書館中至今還收藏著未被胡文楷發現的女性著作。這些女性著作在上海北京的拍賣行中與繪畫瓷器一起被拍賣。這意味著除文學價值外，對於私人收藏者和藏書家來說，這些著作還獲得了與藝術品和文物相等的價值。

④ 參見：劉詠聰：《目錄繫於史學》，第24頁。

⑤ 《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曾在中國和日本通過文檔研究發掘女性寫作文本，以書寫她們自己眼中的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國女性文化史。^①使用女性寫作文本作為原始文獻來源以支持她們的論述，為她們對歷史的修正提供了嶄新的證據和新鮮的視角。數量足夠的龐大的明清時期女詩人女作家所揭示的歷史現實，對傳統中國女性受害者的形象提出了挑戰。這些女性一度被稱為沉默的、不識字的、裹足於深閨、深受儒家父權制的壓迫。這一形象被證明是由二十世紀早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知識階層的現代化話語創造的陳詞濫調。

因此，在很多重要方面，只有當我們對女性自己在文本中所記錄的言語和行為、情感與生活經歷加以考查，我們才能開始消解過分單化的陳舊觀念以獲得不同的視野，並進而揭示出構成中國社會和文化結構的複雜多樣。孫康宜、管佩達(Beata Grant)、萊林·羅伯遜(Maureen Robertson)和魏愛蓮(Ellen Widmer)以及其他文學研究學者的開創性著述，也通過對中國女性著作的審視，對顛覆傳統中國女性受壓迫的形象作出了貢獻。^②通過女性著作的文本分析，有些研究將女性詩歌創作看作與占支配地位的文學傳統之間進行的辯疑(negotiation)與干預(intervention)，同時也看作是性別意識與主體性在特定詩歌體裁中的表達。而其他研究關注女性文學實踐和社交關係網絡、編撰文集的慣例和她們的家庭與宗教信仰；所有這些在女性寫作文本中都是顯而易見的。不過，在傳統中國，能夠有機會接受家庭教育、精通文學並選擇寫作的女性，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些有著作存世的女性則少之又少。但是，她們在寫作這一現象本身已經具有歷史意義，現代中國人理應為這些女性的文學成就感到驕傲。

由於文學研究的學者們特別關注文本產生，他們在有關明清婦女著作的研究過程中不得不面對一些最根本的障礙。首先，最基本的一點就是，不僅因為這些文本現大都收藏在中國的善本古籍書庫中，而且在女性寫作和出版樣式能被識別前，女性作者文本必須得到挖掘，還必須保證發現足夠的數量。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所依靠的文本來源傾向於幾部大型明清女性詩歌總集。這些總集比女性個人文學別集更為人熟知，也較易獲取。^③清代女學者惲珠編纂的《國朝閨秀正始集》就是一個重要的例證。出版於

① 對於她們二人畢路藍縷的富有創新精神的著作的概括，見伊維德教授在本書序言中對高彥頤的《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4)和曼素恩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加州大學出版社，1997)所做的論述。

② 有關這些著作，參見伊維德教授的序言。

③ 參見孫康宜在地開創性的論文中介紹和討論的總集目錄。見《明清女性詩歌總集和選錄策略》(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原載《蓋斯特圖書館館刊》(The Gest Library Journal)，第五期，1992年，第119—160頁。收入魏愛蓮、孫康宜編《中華帝國晚期中女性寫作》(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7，第147—170頁。

一八三一年的《國朝閨秀正始集》及其出版於一八三六年的續編《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共收錄從一千五百多位女性詩人著作中選取的四千多首詩作。總集，就其性質而言，由選錄的作品構成，編纂者根據特定的評判標準選取這些作品。如此預先設定標準的做法，可能使讀者形成曲解的觀點，使原本可以通過檢視別集了解的作者個人寫作實踐的廣度變得模糊不清。盛清時期，惲珠就以對女性的道德見解聞名，她將她的總集編選視為清帝國更為龐大的道德教化工程的一部分。作為編纂者，她選擇符合道德標準的女性詩人，甚至修改她們的詩作以體現她對女性道德的理想。^①惲珠修改女性詩作的「極端」例子是她對袁枚之妹袁機的诗作《聞雁》所做的修正，以致該詩主題變成原作不具有的，強調女性貞節與順從的美德。^②

胡文楷的書目在為婦女豐富的原始寫作資料提供證據的同時（雖然當時一些作品可能依然存世），也使我們真正意識到無法接觸這些個人別集以利研究。就現在所知，明清時期的社會和文化風氣、經濟形勢、商業化的印刷出版業、家庭出版物的盛行、家庭生活的私人化以及其他因素，都對文人家庭中閨秀教育風氣的日漸盛行有所影響；在某些地區，特別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及北京、廣州這樣的都會城市，這種風氣尤為普遍。女性記錄下她們努力爭取父母給她們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機會，並且以詩歌作為自傳性記錄的方式，終其一生詩作不斷。這些女性詩作中的許多主題與題材，借鑒模仿了對應的男性角色，即文人士大夫的詩歌創作。對於女性來說，詩歌同樣是私人交流與社會交往的一種方式。女性同樣以詩作應酬題贈、以詩題畫、以詩記載游歷或日常與精神生活，無論是在太平盛世時期的深閨，還是遭逢世亂，作為逃難者在逃離戰爭和叛亂地區的路途中。同時也有特別富有女性性別特征的主題和境況，如吟詠刺繡的詩歌和絕命詩。但是，這些僅僅是我們對中華帝國晚期的女性文本制造進行深入檢視的開始，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能夠接觸、閱讀她們著作的機會實在有限。^③

① 有關惲珠的總集和她通過詩歌提高女性道德的論述，參見曼素恩的《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第三章《寫作》，與李小榮（Li Xiaorong）的《清代性別與文本政治：以「正始集」為案例》（*Gender and Textual Polit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Zhengshi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70卷第1期，2009年，即將出版。

② 參見筆者在「明清婦女著作」主頁所做介紹中的兩個版本：<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english/introduction.htm>。

③ 參見筆者論文：《女性之手：中華帝國晚期和民國女性日常生活中作為知識領域的刺繡》（*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載《中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25卷第1期，6月，2004年，第1—58頁；《明清女性創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Signifying Bod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載《男女》（*Nan Nu: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第3卷1期，2001年，第105—142頁。

女性寫作文本的當代傳播：以西方為例

由於意識到女性作者文本難以接觸帶來的問題，女性主義學者啟動多項計劃以保護女性著作，也為研究女性著作提供便利，并且他／她們的努力自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以來已在西方取得進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發展早期對傳統的、類型化的女性形象的批評和消解，現在讓位於對各個歷史背景中的女性所創造的文本與史料的恢復與挖掘，因為過去這些文本和史料都處於邊緣和被忽視的地位。女性通過文本發出聲音或在文本中所銘刻的主體意識，即使這些文本被認為經過語言、文學傳統和意識形態的淡化，仍成為歐洲傳統中有關近代早期女性研究的一個關鍵部分。女性創作的文本僅僅以塵封在大英圖書館或其他難以借閱的珍本檔案的方式存世遠遠不夠，理應通過印刷品或現代科技方式得到傳播。如今，幾種有關歐洲近代早期女性作家的電子資源已經通過網絡得到傳播。芝加哥大學的法語女性作家項目作為法語文庫美法合作研究項目(ARTFL)的一部分，建立了一個「十六至十九世紀法國婦女著作可檢索數據庫」，并且「目前已經收入四十位女性作者的著作」。^①布朗大學同樣也有一項「女性作者項目」和「女性作者在線數據庫」。該網站稱，這是一個「長期的研究項目，致力於近代早期女性寫作與電子文本的建立。(我們的)目標是從檔案中重現前維多利亞時期的婦女著作，向教師、學生、學者以及普通讀者開放以利用於他們的閱讀」。^②雖然通過網絡可以免費獲得芝加哥大學「法語女性作者」項目中的四十種婦女著作，但是布朗大學的「女性作者在線數據庫」中的從十六到十九世紀三百多種女性作者文本資源，只對付費的機構和個人開放。而且這兩個數據庫都對文本本進行文字輸入，因此讀者無法一睹原刊或手稿的真實面目。

另一個重要的項目是《近代早期的英國女性：精選著作影印文庫》——一套多系列多卷冊的影印叢書。這套叢書復制的是英格蘭近代早期(1500—1750)女性創作的作品和有關女性的著作，並於一九九六年開始正式出版。在貝蒂·特拉維茨基(Betty S. Traviskey)和安·雷克·普雷斯考特(Ann Lake Prescott)主持編輯下，這項正在進行的雄心勃勃的出版計劃仍繼續由阿什蓋特(ASHGATE)出版公司負責出版。該叢書主編對英格蘭近代早期的歷史變遷所做的論述同樣適用於我們在中國研究領域目睹的情況：

① <http://www.lib.uchicago.edu/efts/ARTFL/projects/FWW/>。他們的網站顯示，這是在巴黎的「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與芝加哥大學之間的一項合作項目。

② <http://www.wvp.brown.edu/>。

直到最近，研究近代早期的學者們假定英格蘭近代早期不存在朱迪·莎士比亞(Judith Shakespeares)這樣的女性。為了建構能對當時女性的所讀所寫和所做所為進行考察的英格蘭近代早期歷史，當今一代學者投入了大量精力。通過努力，當代學者修正了近代早期和當代所建立的有關近代早期女性的傳統表述。近代早期女性研究從而成為重寫近代早期歷史的最重要一種方式之一，甚至就是最重要的方式。^①

他們進一步說明，重印這些女性著作的目的在於「為研究近代早期歷史的女性主義批評得以發展移除一個主要的障礙，即該領域基礎的文本難以獲取的局限」。^②

《中國歷代婦女著述叢刊》這部重印系列，以哈佛燕京圖書館中的明清婦女著作為發端，有著同樣但更為廣闊的目標。正如我們所見，從女性視角對中國歷史的重寫早已開始。重印中華帝國時代開始的大量女性著作，是《中國歷代婦女著述叢刊》系列致力於以出版形式復制中國女性寫作的第一部分。從長遠來看，我們期待所付出的努力能起到和歐洲相似的效果，即通過這些從湮沒無聞中重現天日的重要文獻，激勵以多視角對中國文學、文化與歷史進行重新探討和創新研究的發展。這一新舉措有可能根本改變我們對中國豐富歷史的闡釋方式，不僅對中國領域還對人類歷史的研究方向有所影響。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的明清婦女著作的特征。

女性寫作文本的當代傳播：哈佛燕京文庫與前現代中國婦女著作和出版的形態

一九八三年，羅伯特·哈特教授的後人向哈佛燕京圖書館捐贈了哈特教授私人收藏的近三百種中國珍本古籍，^③其中就包括

① 貝蒂·特拉維茨基和安·雷克·普雷斯考特：《主編序言》(Preface by the General Editors)，見《近代早期的英國女性：精選著作影印文庫》(The Early Modern Englishwoman: A Facsimile Library of Essential Works)之《系列3——近代早期女性研究核》著作：第2部分》(Series III, Essential Work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Women: Part 2)，阿什蓋特出版公司(Ashgate Publishing Co.)，卷8，第vii頁，2007年。

② 同上。

③ 羅伯特·哈特教授與著名的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并非同一人。赫德曾任清政府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司長。據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鄭炯文先生(James Cheng)介紹，除了知道羅伯特·哈特曾執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關他的其他信息知者甚少。

了五十三種明清女性著作別集。^①除此之外，哈佛燕京圖書館另有四十多種女性文學別集的收藏，其中的一小部分收藏於珍本室，其余收藏在普通中文古籍部。在西方大學圖書館中，擁有如此豐富的女性著作收藏，是獨一無二的；即使在中國，也十分罕見。^②除了若干總集出現在晚明時期，大部分著作的年代可追溯到清代，而且以女性個人文學別集居多。如上面所說，此類女性別集不易發掘，但是對進行深入的研究十分重要。這些女性別集不僅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她們的文學才能、風格和創作傾向，某些情況下也能讓我們更能充分了解她們的人生經歷。^③通常只有當這些女性的寫作出版或者至少以手稿的方式保留下來，她們的一些詩作才有可能被保存、傳播並收錄進總集。因此，為了能使讀者和研究者能夠接觸到這些珍貴的文學遺產，筆者從哈佛燕京圖書館選取六十一種女性文學別集，收入《中國歷代婦女著述叢刊》進行重印。其中的三十一種來自哈特收藏，占全部選錄著作數量的一半。

在前現代中國社會，女性作品的出版、流傳和保存的歷史複雜多樣。根據正統儒家觀念，由於女性在家庭中的正當地位和職能是與男性在家庭以外的世界中正當地位和職能相輔的，因此在公眾事務中，女性寫作的地位或社會功能沒有得到承認。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中，女性被排除在科舉考試之外，禁止做官為國效力。^④從十六世紀開始，各種社會和經濟因素鼓勵助長了在家教育女子的風氣。女子受教育被認為是家境殷實和婚姻門第的象征，特別是在文化精緻經濟富足的江南地區。^⑤對於士紳家庭來說，在家中給閨秀們某些形式的文學和儒家教育可以實現多個目的：這些家庭可以保持它們的文化精英地位；父母為精心栽培的女兒安排與自家社會、經濟地位相當的家庭聯姻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閨秀們在通過學習《女誡》、《列女傳》等儒家婦道教誨以獲得道德教育之外，還在詩歌、繪畫和書法方面受過良好訓練，那麼她們與有學識的丈夫建立志趣相同的和睦關係的機會更多。她們也可

① 其中若干女性著作另有副本。

② 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擁有更大規模的明清女性著作收藏。

③ 對於由那些女性自己按年代編排的大型別集來說，這樣的看法是可靠的。沈善寶(1808—1862)的別集《鴻雪樓詩選》與甘立媛的別集《詠雪樓稿》就是突出的兩個實例。有關沈善寶的研究，參見筆者論文《書寫自我，書寫人生：沈善寶(1808—1862)性別化自傳／傳記的書寫實踐》，收入姚平(Yao Ping)編《西方中國婦女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論述甘立媛的相關章節參見筆者專著《她自身為作家：明清時期的社會性別、能動性與寫作》(Herself as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的第一章，夏威夷大學出版社，2008年。

④ 武則天建立大周(690—704)後的短暫統治時期是例外。

⑤ 參見：高彥頤：《閨塾師》，第一章。

能在處理家庭事務方面成為有能力的幫手。^①但在同一時期，認為女性寫作不應流傳於深閨之外的看法仍十分普遍，當時流行的說法「女子無才便是德」便是最好的例證。某些時候，那些強烈反對女性接受教育甚至反對女性識字的人士會援引這句話。

明清時期許多文士家庭的女子不僅接受過讀書和寫作的訓練，同樣也接受詩歌教育。而詩被認為是一種適合女性自我表達與交流的文體。幾乎無一例外，成年后女性的標準生活軌跡不可改變地指向婚姻和妻子（兒媳）與母親的家庭角色。不同家庭中不同的女性以固定、持續的方式從事寫作的機遇大不相同。婚后丈夫和公婆的態度以及家庭環境往往是決定女性能否或是否願意繼續寫作的關鍵因素。胡文楷所收錄明清時期的四千多種女性別集，是這些女性自身努力的成果和堅持寫作的有力證明，也是來自他人，尤其是她們的丈夫、父親和其他男性親屬的支持以及他們為保護這些女性寫作所做努力的明證。這些男性當中，為人子者在出版母親著作的過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無論是母親生前還是身後。

在檢視本重印系列中從哈佛燕京圖書館選取的六十一種明清女性別集時，我們能確定若干出版形式。有三十種是獨立出版物，即使不是原版，也是后來的再版形式。這些別集有可能原本以其他不同的方式出版，例如原是作為丈夫著作的附錄，但后来獨立成集出版。袁枚最著名的女弟子席佩蘭（1760—1829 後）的詩集即是一例。本叢書收錄的席佩蘭一八九一年版《長真閣集》原附錄在其夫孫原湘的《天真閣集》後。但在一九二〇年，掃葉山房將《長真閣集》作為一部獨立著作分開出版。^②明嘉靖時期女詩人楊文儷的《孫夫人集》原附錄在其夫孫陞的《孫文恪公集》後。但本叢書收錄的《孫夫人集》是作為一部獨立的著作，由杭州藏書家丁丙所輯，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刊印的《武林往哲遺著前編》中重印出版。還有一例是吳宗愛（1650—1674）詩集的出版所經歷的復雜過程。^③這位浙江永康的才女生活在明清易代的混亂時期，嫁入徐家后不久即守寡。她的傳記中說，當叛亂者進攻她的家鄉時，她不惜犧牲自己以引開叛亂者，然后自盡身亡。一百七十年后，一位當地官員有感於她自我犧牲的故事，收集她當時存世的詩作，并在 一八四二年以《絳雪詩鈔》為題刊印出版。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五二年間，吳宗愛的詩集曾再版三次。這些版本的木刻底板

① 參見：曼素恩：《為婚姻培訓女兒：清代中期的新娘與妻子》（*Grooming a Daughter for Marriage: Brides and Wives in the Mid Ch'ing Period*），收入華若璧（*Rubie S. Watson*）、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編《中國社會的婚姻與不平等》（*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加州大學出版社，1991 年。

② 關於這個版本，參見「明清婦女寫作」網站（[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 mingqing](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

③ 由於后世男性官員出版吳宗愛的詩作，使得她從默默無聞到成為著名的才女與烈婦的轉變過程，參見華瑋的詳細研究：《從私生活到公眾表演：清初女子吳宗愛的構成記憶與（重新）書寫》（*From Private Life to Public Performance: The Constituted Memory and (Re)Writings of the Early-Qing Woman Wu Zong'ai*），收入方秀潔、魏愛蓮編《內閣與超越：從明至清的女性作家》（*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 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待出版。

可能被毀於太平天國時期，正如當時其他許多男性或女性作者的著作遭受的同樣命運。一八七四年和一八七五年，她的詩集以《徐烈婦詩鈔》為題再次重印。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正是一八七五年版。吳宗愛詩集出版的獨特過程演示了文人士大夫并不罕見的一種做法。他們被年輕才女的悲劇性生活經歷所吸引，而這些女性歷史存在的真實性經常是模糊的。這些女性還包括宋代的朱淑真，晚明的馮小青以及十八世紀清代的賀雙卿。這些男性願意付出極大努力以記錄並出版這些女性的詩作。^①

其他女性著作的出版更多依賴於個人生活環境。在很多情況下，才女早亡後，男性親屬負責她們遺作的出版。例如，當最有天份的女兒葉小鸞在十六歲病故後，其父葉紹袁（1589—1648）出版了她的文集。^② 在本叢書中，吳秀珠（1808—1827）去世當年，她的詩集《絳珠閣繡餘草》便由其父吳蘆仙付梓刊印。^③ 有時為了慶賀女性作者的生日，她家庭成員和朋友會為她出版詩集，張縉英（1792—？）刊印於一八四〇年的別集《澹鞠軒詩初稿》就是一例。當時張縉英隨在官府任職的丈夫居住在北京。她的弟弟張曜孫在原籍常州，將他姐姐的詩稿輯為詩四卷詞一卷，交付家坊宛鄰書屋刊印成集，以祝賀張縉英的生辰。^④ 我們能從重印本中看到，詩集中兩篇序言的一篇是由張縉英的閨中密友、女學者和女詩人沈善寶所作。有十六人寫了題跋，其中有些直接恭維她的詩歌才能。另有五十五人（其中幾乎半數是女性）獻上題辭。五十五首詩中至少有兩首提到張縉英已經五十歲，其中的一首為她的妹妹張

① 有關朱淑真，參見伊維德：「男性幻想與女性現實：朱淑真和陳玉娘以及她們的傳記」（*Male Fantasies and Female Realities: Chu Shu-chen and Chang Yu-niang and their Biographers*），收入宋漢理（*Harriet Zurndorfer*）編《帝制時代的中國婦女：新視角》（*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 New Perspectives*），萊頓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9—52頁；有關馮小青，參見魏愛蓮：《小青的文學遺產與中華帝國晚期的婦女作家地位》（*Xiao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華帝國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第13卷1期，1992年，第111—155頁。有關賀雙卿，參見方秀潔：《十八世紀解構／建構女性偶像：「西青散記」與雙卿故事》，收入魏愛蓮、孫康宜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女性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7年，第264—281頁；羅溥洛（*Paul Ropp*）：《謫仙：尋找中國農婦詞人雙卿》，密歇根大學出版社，2001年。對這些女性存在的歷史真實性，西方學者持一定程度的懷疑態度，認為她們是由男性在不同程度上創造的結果。而中國學者傾向於接受這些女性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參見杜芳琴《賀雙卿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還可參見伊維德教授的序言。

② 參見：葉紹袁《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③ 參見：吳蘆仙序，《絳珠閣繡餘草》。在序言中，吳蘆仙為極富才華、天性善良的女兒的短暫一生撰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傳記。他提到吳秀珠七歲時與郭蘭芳定親。他的敘述表明吳秀珠在去世前還未與郭蘭芳正式成親。胡文楷將她記錄為郭蘭芳的妻子是錯誤的。（見《歷代婦女著作考》第305頁）

④ 宛鄰書屋是他們的父親張琦的書齋。由張琦好友楊金監撰寫的題跋中提到了該書的出版情況。楊金監本人也是常州人，見《澹鞠軒詩初稿》題跋八頁下。有關張姓家族的論述，參見曼素恩的名作《張門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加州大學出版社，2007年。

綸英所作，題為《題「鞠軒詩稿」即壽孟緹姊五十》。^①

凌祉媛(1831—1892)的詩集《翠螺閣詩詞藁》刊印於一八五四年。在她早逝後，她的丈夫、杭州著名藏書家丁丙(1832—1899)精心刊印了這本詩集，以作為對她短暫一生的深切懷念。傷心欲絕的丁丙將凌祉媛的詩稿整理輯成小冊付印并托親友寫了九篇序言，其中的兩篇由杭州著名才女吳藻和關瑛撰寫。這本詩集中也包括了丁丙自己撰寫的《亡婦凌氏行略》，他請求凌祉媛的父執莊仲方為她撰寫的《傳》，以及他懇請他們夫婦二人的朋友以及當地士紳名媛五十人為這部詩集所作的題辭。^②此外，丁丙還將自己悼亡詩集《舞鏡集》附錄於後。在《翠螺閣詩詞藁》中，凌祉媛的一百多首詩作按年代編排，反映了在短暫一生中她是如何井井有條地精心保護她的手稿的。這部詩集沒有分卷，但是按照不同的標題分成幾個部分：《停鍼倦繡集》收錄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間創作的詩歌，《南園萍寄集》收錄一八四八年中的詩作，《珠潭玉照集》收錄從一八四九年到一八五〇年的詩作，《畫眉餘晷集》收錄最後一年即一八五一年間的詩作。《翠螺閣詩詞藁》遵照慣例以詞一卷附錄於尾。

在前現代中國，夫妻間的深厚感情建立在許多不同的層面上。婚姻關係不僅聯接兩個個體，而且還聯接兩個家庭，具有法律、禮儀與社會意義。從明末開始，隨著士紳家庭女性接受藝術和寫作教育的人數不斷上升，追求婚姻美滿的理想開始在男性與女性中成為風尚。如果一位妻子受過良好的教育，因此能與丈夫分享學識、學問、文學和藝術帶來的樂趣，對男性來說這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事情。也許這能夠解釋為什麼男性將妻子的詩集附錄或附刻於自己的著作後的行為越來越多。在這套重印系列叢書中，正如下表格顯示，有十三種女性著作附錄於丈夫的著作後。如果我們算上最初以附錄形式出版的其他女性著作，這些著作將占本叢書著作總數的六分之一強。

妻：		夫：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集名	姓名	籍貫 集名
1. 金至元	(清雍正前後) 河北河間 《雲書閣牘稿》	查為仁	順天宛平 《蕉塘未定稿》 乾隆八年(1743)
2. 陸鳳池	(1680—1711) 上海青浦 《梯仙閣餘課》一卷	曹一士	上海青浦 《四焉齋集》(1750?) 曹氏家刊本

① 《澹鞠軒詩初稿》題辭，第二頁上——二頁下。

② 杭州孫佩蘭在題辭部分也獻上了她的四首詩作。她的《吟翠樓詩稿》被本叢書收入。

妻：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集名			夫： 姓名 籍貫 集名
3. 張淑(1756?—1808)	安徽懷寧	《晚香詩鈔》	熊寶泰 安徽 潛山 《藕韻類稿》 嘉慶十三年(1808) 潛江熊氏刻本
4. 曹貞秀 (1762—1822)	江蘇長州(蘇州)	《寫韻軒小藁》	王芑孫 江蘇長州 《淵雅堂集》 嘉慶二十年(1815) 增刊本
5. 王采薇 (1753—1776)	江蘇武進(常州)	《長離閣集》	孫星衍 江蘇陽湖(常州) 《芳茂山人詩錄》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 刻本
6. 梁德繩 (1771—1847)	浙江錢塘(杭州)	《古春軒詩鈔》	許宗彥 《鑑止水齋集》 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本重刊
7. 王甥植 (1789—1825)	江蘇江陰	《茗韻軒遺詩》	季芝昌 《丹魁堂詩集》 同治四年(1865) 紫琅寓館刻本
8. 錢衛生 (1802—1846)	浙江嘉興	《梅花閣遺詩》	張金鏞 浙江平湖 《躬厚堂集》 同治十年(1871) 平湖張氏刻本
9. 錢惠尊 (1792—1817)	江蘇陽湖(常州)	《五真閣吟稿》	陸繼輅 江蘇陽湖(常州) 《崇百藥集》 光緒四年(1878) 合肥學社刊本
10. 湯瑤卿 (1763—1831)	江蘇陽湖(常州)	《蓬室偶吟》	張琦 江蘇陽湖(常州) 《宛鄰詩》 光緒十七年(1891) 宛鄰書屋刻本
11. 席佩蘭 (1760—1829後)	江蘇昭文(常熟)	《長真閣集》	孫原湘 江蘇常熟 《天真閣集》 光緒十七年(1891) 強氏南皋草廬刻本
12. 嚴蘅 (1826?—1854?)	浙江仁和(杭州)	《嫩想盒殘稿》	陳元祿 浙江錢塘 《十五福堂筆記》(收入《媚鏡樓叢刻》乙帙) 民國十一年(1922) 上海聚珍做宋印書局鉛印線裝做宋本
13. 姚淑 (清初人)	江蘇江寧(南京)	《海棠居詩集》	李長祥 四川達州 《天問閣文集》(收入《求恕齋叢書》) 民國十一年(1922) 南林 劉氏印本

這份表格上的名單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丈夫是乾隆嘉慶年間有名的考據學家孫星衍、孫原湘和張琦(其兄張惠言更為著名)。這些男性將他們妻子的詩集附錄於自己的著作具有多層面的意義：維護婦學在復古運動中的合法地位、美滿婚姻的表現、家族的

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地方成就的標志。地域因素超出了作為考據學中心的常州,在其他如常熟、杭州這樣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文化中心,同樣通過合刻的出版方式使夫妻雙方的結合流傳后世,以高度體現婚姻的美滿(筆者將在下面提到地域分布的問題)。

最后,在出版過程中,夫妻雙方的著作「平等地位」現象值得注意。本叢書中,兩位非凡婦孺的著作得以出版就體現了這種情況。季蘭韻(1793—約1818)和左錫嘉(1831—1896)開始孀居時都算年輕。當屈頌滿(1792—1815)在二十三歲去世時,他的妻子季蘭韻才二十一歲。左錫嘉的夫君曾詠(1813—1862)在太平天國時期去世,當時左錫嘉三十一歲。兩位女性獨自撫養她們的孩子成人,而且繼續寫作終生。當她們的著作在其子安排下得以出版時,她們以「合刻」這一有違常規的形式將她們丈夫的生前著作一并收錄。季蘭韻和屈頌滿的合刻文集定名為《墨花仙館合刻》,左錫嘉和曾詠合刻定名為《曾太僕左夫人合稿》。左錫嘉在她感人的詩中,記錄了她從江西前往安徽撿理丈夫的棺柩,然後運往丈夫原籍成都郊外華陽安葬的旅程。最后,她還為亡夫撰寫了墓志銘。^①

有關這些女性作者娘家和夫家如何盡心保護女眷們的文學創作,這套系列叢書中的女性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視角。袁枚將他三個妹妹的詩集一起出版是我們能舉出的著名例證。其他一些丈夫與家庭成員著作出版的實例包括以下家刻叢書中收錄的女性著作:

1. 袁機(1720—1759),仁和人,《素文女子遺稿》一卷,嘉慶間(1796—1820)刻(收入《隨園三十種》)
2. 袁杼(約1727—約1776),仁和人,《樓居小草》一卷,嘉慶間(1796—1820)刻(收入《隨園三十種》)
3. 袁棠(1734—1771),仁和人,《繡餘吟稿》一卷,嘉慶間(1796—1820)刻(收入《隨園三十種》)
4. 冒俊(1828—1881),如皋人,《福祿鸞鴛閣遺稿》一卷,光緒十年(1884)刻本一冊(收入《如不及齋彙鈔二集》₃₃)
5. 梁蘭漪(1727—?),儀徵人,《畹香樓詩稿》二卷,一冊,光緒二十一年(1895)飛鴻閣書林石印本(收入《汪氏家集》)
6. 龍黎春熙(清),廣東順德人,《靜香閣詩存》一冊,光緒戊戌(1898)順德龍氏螺樹山房刻本(收入《螺樹山房叢書》)

福建侯官陳壽鵬家庭女眷著作的出版經歷提供了一個感人的範例。當妻子薛紹徽(1866—1911)與大女兒陳雲(1885—1911)

① 見《冷吟仙館詩稿》,文存,四頁上—八頁下。